

近代以来池州融入长三角经济圈的空间进程

和乐乐

池州地处长江下游南岸,作为长江流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一直具有浓厚的“长三角情结”,这种情结并非短暂形成的,而是植根于千百年来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尤其是近代以来,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回顾池州与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的空间互动,这一脉络将会更加清晰。

一、行政同属:长三角成员的历史基因

池州与长三角地区在行政建制上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元代池州“先后隶属于浙江行中书省”,明代池州“直隶南京”。清顺治二年(1645年),南直隶改为江南省,池州“隶属于江南布政使司”。康熙六年(1667年),江南省被划分为江苏、安徽两省,池州归属安徽管辖。这一行政建制的追溯,意味着池州与江苏、上海地区不仅有着良好的地缘关系,更在行政建制上同属于一个治理体系。这种地理空间上的认同,为近代以来池州与长三角核心区的商贸联系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二、商贸互通:池州与上海港口的双向互动

池州作为长江下游经济带的核心城市,境内长江通航水道160余公里,是池州乃至皖南物产运销上海的重要通道。近代上海开埠通商,使其一跃成为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贸易枢纽,池州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核心区贸易往来愈发紧密,逐渐形成了以池州大宗商品为纽带的长江商贸走廊。

茶叶是池州外销的大宗商品,品质上乘,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良好的声誉。1915年,“九

华山天台道僧洞一带的黄石溪毛峰、九华闵园、九华毛峰同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五口通商之后,上海的商贸功能更加完善,池州茶叶外销集散中心由广州转移至上海,重塑了池州茶叶的外销格局。民国时期,随着徽杭公路与沪杭铁路的开通,池州商贸东向发展的格局更加明显。池州茶叶经上海港运销至国际市场,是池州融入长三角经济圈贸易网络的真实写照。

木材贸易是池州融入长三角经济圈的又一重要纽带。池州林木资源丰富,尤其是青阳县木材的声誉远播省内外。青阳木镇向来为“泾青南三地交界地区竹木材炭集散地”,商船以此为基地将木材“运往大通,然后再转运至安庆、芜湖、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由于材质优良,一直以来受到长三角地区建筑与造船业的青睐。晚清民国时期,随着长三角地区建造业的发展,大量木材沿长江下游航道直达上海、南京等地,不仅满足了沿线城市建设的需求,亦促进了池州木材加工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返程时运回池州本地所需商品。这种资源互补型的商贸往来,深化了区域间的经济依存关系。

煤炭工业是池州与长三角经济融合的典型例证。1877年,近代安徽首家使用机械生产的煤矿(池州煤矿)创立,聘请国外工程师,开启了安徽近代矿业的先河。为了融资池州煤矿在上海股票交易所上市,股票在上海公开交易,意味着池州产业资本已进入上海金融市

场。池州煤矿“所产之煤皆运往上海”,1890年经芜湖海关出口突破万吨大关,达14365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海等地市民用煤的需求。民国时期,上海、浙江等地商人开发池州馒头山煤矿,为了方便煤炭的运输,于1910年修建了铁路,这条铁路是池州与上海资本联系的重要工业遗存。

从茶叶、木材的东向运销到近代化煤炭工业的创立,池州与长三角的商贸往来已超越了传统以有易无的交换,进入了资金、技术以及制度深层次的互动阶段。长江黄金水道、上海港口、近现代金融,共同构成了近代池州融入长三角经济圈的空间通道。

三、“小三线”与工业文明的融入

20世纪60年代末,为响应国家号召,上海在皖南地区建立80多个后方工业基地,池州承接20多家,选址多在深山之中。大批上海干部职工离开繁华的都市来到山区工作,算上家属总数达数万之众。

这些企业涉及军工生产与民用工业等多个领域。具体而言,有机械制造类、冶金类、化工类、电力类、交通与通讯类、卫生与文教类。其中,八五钢厂员工近万人,可见其规模之大。上海革新电机厂总投资705万元。此外还有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承建的长江医院以及其他配套的生活设施。

上海“小三线”建设对池州具有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贵池的507码头与东至的305码头的建设增强了池州货物吞吐的能力。各电

厂的设立为池州电力提供了保障。上海职工带来的电影院等丰富了池州人民的娱乐生活。以此来看,小三线建设将沿海地区的先进技术进一步传入池州。

1985年根据中央的指示,上海进行小三线建设人员回沪,这段长达24年的建设史,成为池州与上海之间一段难以忘怀的“贵申请”。小三线建设虽已过去,但为池州留下了宝贵的工业遗产与精神财富。

回顾近代以来池州融入长三角经济圈的空间进程,清晰地展示出这样三个层次。从元明清乃至更早的行政同属奠定了“制度空间”;长江商贸贯通的流通空间;再至小三线建设的产业空间。缩短了池州与长三角核心区之间的空间(物理上、经济上、文化上)距离。

这一空间进程表明,池州东向发展是一以贯之的历史大趋势。悠悠长江水,从以有易无的简单商贸到小三线建设的产业融合,池州从未停下东向入海的脚步。当今池州要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充分发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崛起等多重国家战略叠加优势”,进一步东向融入长三角经济圈,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作者简介:历史学博士,池州学院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2026年池州市创新发展研究课题:近代池州融入长三角经济圈的角色转换与空间演进研究,项目编号:2026YB05.

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传统美德传承发展研究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米文华

中华传统美德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练了中华民族对于精神世界的美好追求。这既是涵养社会道德风尚的力量源泉,又是维系民族精神的文化根基。随着社会进入数字时代,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的崛起,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诸多变革。部分外来文化借助数字传播的优势,快速渗透扩散,给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基于此,推进中华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势在必行,这既是新时代新挑战下增强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一、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传统美德传承的价值意蕴

(一)理论价值:立足文化根基,推动传播理念深度融通。时代的发展进步,使社会结构产生深刻变革,大众的生活模式与信息接收途径日趋多元,传播媒介的迭代升级带来了风险,同样也带来了机遇。

通过数字技术的介入,为传统美德的理论重构与价值融通提供了全新学术路径与阐释维度。数字技术凭借数据筛选、精准适配、全域传播的独特优势,实现了对传统美德的系统性梳理、现代化解读。通过大数据技术对传统道德典籍、民俗文化、道德故事、先贤思想进行数字化分类整合,精准筛选出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适配新时代社会治理、贴合当代大众生活的优质道德内核。基于数字化技术对传统美德进行创造性转化发展,能够进一步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化道德理论框架,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本土化、时代化的理论支撑。

(二)实践价值:拓展传播路径,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实效。立足传统美德文化,推陈出新,构建起符合时代要求的道德体系、提升全民道德素养,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中华传统美德的传统传播模式通常以课堂讲授、书本学习、线下宣讲等方式,存在形式单一、说教色彩浓厚、参与度低、覆盖面窄等局限,难以适应青年群体碎片化、娱乐化的认知习惯。

数字技术凭借即时性、交互性、全域性、分众化特征,重构传统美德传播路径,打破时空壁垒,实现美德传播跨地域、跨年龄、跨阶层覆盖,使美德理念渗透社会各个角落,显著扩大

传播覆盖面与社会影响力,同时将抽象的道德理念转化为短视频、直播、互动游戏、微电影、网络文学、情景短剧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降低接受门槛,增强趣味性 & 吸引力,有效缓解了传统美德的传播困境。

(三)时代价值:凝聚价值共识,服务于文化强国建设。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思潮交织碰撞,社会价值共识面临挑战。中华传统美德作为维系民族精神、塑造文化自信的内在驱动力,在凝聚社会共识、增强民族认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

从国内角度分析,数字技术通过全网传播传统美德和时代价值,挖掘民族道德典范,唤醒全民文化记忆与道德自觉,引导社会形成崇德向善、团结奋进、守望相助的价值共识,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提供精神支撑。从国际角度分析,数字技术依托全球化传播优势,为中华传统美德走向世界提供渠道支撑。以数字媒介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价值理念、展现中华文明底蕴,有助于打破西方话语垄断,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二、数字时代中华传统美德传承的现实问题

(一)技术异化严重,信息茧房限制传播范围。数字时代下碎片化叙事,以及信息茧房效应,二者叠加直接导致传统美德传播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使得传统美德的传播难以形成系统连贯、逻辑完整的文化链条。

碎片化叙事割裂了文化整体性,对中华传统美德的认识,需要考虑到其历史渊源、发展脉络、逻辑关联与精神内核,但数字平台将传统美德完整内涵拆解为零散信息片段,以短视频、短句语录等形式传播,片面呈现美德内涵,导致受众认知片面化、表层化,难以形成系统理解。

信息茧房固化了受众的认知范围,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算法通过对用户浏览数据构建个性化兴趣模型,持续推送同质化内容。在传统美德的传播过程中,算法优先推送娱乐化、流量化内容,导致受众认知视野受限、难以接触美德完整内涵与精神价值,进一步加剧受众对传统美德认知浅层化的问题。

(二)资本深度裹挟,技术泛滥降低媒体权威性。在数字文化传播业态快速发展的当下,

资本逐利性与数字技术工具属性深度绑定,导致传统美德传播偏离价值导向。一方面,资本主导数字叙事逻辑,将传统美德异化为流量变现的工具。为迎合市场偏好,资本刻意放大猎奇内容,甚至歪曲、解构仁爱、诚信、家国情怀等核心内涵,将庄重道德价值简化为博取眼球的流量密码,造成美德价值内核流失。

另一方面,生成式AI降低创作门槛,部分创作者过度依赖技术效率,缺乏对传统美德精神内核、人文底蕴的挖掘,批量生产对传统美德肤浅解读,甚至错误解读的商业作品,严重忽视文化创作的人文属性,使美德传播陷入“重形式、轻内涵”的困境。同时,传播主体的泛化更带来了主流媒体话语权被消解的风险,片面、虚假的解读肆意传播,严重影响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度。

(三)德育引导失衡,网络乱象冲击青少年思想。数字媒介已然成为当代青少年获取信息、认知世界、塑造价值观的核心载体,但教育体系与数字时代发展适配性不足,导致青少年传统美德培育效果薄弱,难以助力青少年构建正向、完整的道德价值体系,网络负面信息冲击青少年价值塑造。青少年心智尚未完全成熟,价值判断能力、信息甄别能力相对薄弱,极易受到网络多元思潮、娱乐化乱象、功利化风气的侵蚀。网络中泛滥的美德解构内容、历史虚无主义言论、利己主义价值观,持续冲击青少年心中的传统美德认知,弱化其家国情怀、崇德向善的价值追求。

而当前针对青少年的数字化德育引导机制不完善,缺乏常态化的网络德育科普、正向价值引导与错误认知纠正体系,无法及时对冲网络负面信息的消极影响。最终造成部分青少年传统美德认知模糊、道德素养缺失、价值信念弱化等诸多问题。

三、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传统美德传承的实践路径

(一)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绝对领导。立足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战略大局,以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传统美德传承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绝对领导,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完善党建引领数字化治理机制,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宣传部门牵头统筹、文旅、教育、网信等部门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破解数字文化传播碎片

化、治理松散化、资源分散化问题。由党组织牵头开展整体规划与制度设计,出台传统美德数字化传承专项实施方案,明确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与实施规范。同时建立长效运行机制,统筹技术应用、内容建设、阵地管理与人才培养,整合各类数字文化资源,推动传统美德数字化传承从零散自发发展转向系统化、规范化、可持续化发展。

(二)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传统美德数字化传承,首要基础工程就是系统梳理、精准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道德精髓、价值理念与人文精神,夯实数字赋能的内容根基。

基于此,必须立足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要求,依托学术研究、文化普查、资源梳理等方式,对中华优秀传统美德资源进行系统性整理与科学化提纯。既要立足经典又要推陈出新,系统挖掘儒家、道家等传统思想体系中的道德精华,剔除封建糟粕、摆脱陈旧落后的时代局限,传承符合当代社会发展规律、契合社会主义道德要求、适配现代社会治理的优秀道德理念。聚焦个人修身、家庭家风、社会公德、家国大义等维度,分类梳理诚信处世、勤俭律己、孝亲敬老、宽厚仁爱、担当尽责等核心美德内容,构建条理清晰、内涵纯正、体系完整的传统美德数字资源库,为后续数字化转化、创意化再生产提供权威、优质、系统的内容源头。

(三)以规模化、精准化输送摆脱传播困境。一方面依托数字传播矩阵实现范围化全覆盖,以短视频平台为核心,构建社交新媒体、数字文创阵地等多元数字载体,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传统美德传播网络。通过大范围、常态化的正向内容供给,对冲网络不良思潮的负面影响,持续营造崇德向善的网络氛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成为民众生活的主流内容,补足传统德育传播覆盖面不足的短板。

另一方面,依托大数据、智能分类推送等数字技术,精准研判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兴趣偏好、认知特点与德育薄弱点,构建分层分类、精准化传播输送的内容传播机制。针对低龄青少年侧重孝亲敬老、礼貌友善、勤俭节约等基础美德启蒙教育,针对青年群体侧重家国担当、崇德尚义、责任奉献等价值塑造,依托数字技术实现精准化教育,以此为新一代青少年埋下德育向善的美德种子。